

错失的机会和有限的国际化愿景

汉斯·德·维特、埃斯佩思·琼斯

汉斯·德·维特 (Hans de Wit) : 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荣誉教授

电子邮件: dewitj@bc.edu

埃斯佩思·琼斯 (Elspeth Jones) : 英国利兹贝克特大学 (Leeds Beckett University) 高等教育
国际化荣誉教授

电子邮件: e.jones@leedsbeckett.ac.uk

2021 年 10 月 21 日, 来自九个西方国家的国际教育组织共同发表了《支持国际教育和流动性的共同声明》(Common Statement in Support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Mobility), 作为 2021 年国际教育峰会的成果, 这些机构组织包括: 加拿大国际教育局 (Canadian Bureau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芬兰国家教育局 (Finnish National Agency for Education)、法国高等教育署 (Campus France)、德国学术交流服务中心 (German Academic Exchange Service)、专门从事学术推广与学习导向的意大利教育中心 (Uni-Italia)、荷兰教育国际化组织 (Nuffic)、挪威高等教育和技能理事会 (Norwegian Directorate for Higher Education and Skills)、英国文化协会 (British Council), 以及美国国际教育学院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该声明附有来自九个组织的简要国家报告 (比如就美国而言, 该报告由美国国务院、美国教育部和美国教育部提供)。

前进一步, 后退两步

此次峰会的标题和发布文件题目为《未来发展: 在后疫情的世界中通过国际交流建

设一个更加公平、可持续与和平的世界》(What's Ahead: Building a More Equitable, Sustainable and Peaceful World through International Exchange in a Post-Pandemic World)。乍一看, 文件中提出的一种面向未来的全面和包容的国际教育方法, 似乎相当先进并充满希望。在本标题以及整个声明和国家报告中, 对包容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的提及都表明在新冠疫情之前上述方向无疑已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关键行动路线, 在疫情以后更是如此。这九个组织的政策和倡议, 如学者救援基金 (Scholars Rescue Fund)、难民接受高等教育、能力建设和与其他地区的合作、本土国际化和社会国际化等工作, 在大多数国家报告中都被提及。这些组织为未来的国际教育和流动性发展设定目标的做法是积极的。

但不幸的是, 这份简短的声明本身充其量只能说是在推进教育国际化方面前进了一步却又后退了两步。

西方化趋势

2014 年的时候, 我们认为国际化不应再被视为以西方化 (主要以盎格鲁-撒克逊传统, 特别是英语为主) 的研究范式进行。许

多其他学者和政策顾问主张采用比国际交流与流动所能提供的、更为包容并且去精英主义的国际化方法。更多声音在呼吁课程非殖民化，并减少对盎格鲁圈和西方主导地位的强调，关于这些主题的文章经常出现在新闻报道和同行评议的期刊中。当“纳尔逊·曼德拉湾全球对话”（*Nelson Mandela Bay Global Dialogue*）于 2014 年召开时，参与者来自各个地区的教育协会。由此产生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未来宣言》（*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指出，“国际化必须建立在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体和个人的互惠互利和发展的基础上”。自 2014 年以来，我们是否倒退了？为什么这样一个峰会和来自九个组织的共同声明只代表西方化的发达世界，而不是积极讨论其他地区的观点和立场？

专注于实地流动性

更令人惊讶的是，该声明相当明确地呼吁加强向九个国家的学位学习流动，以及加强彼此国家之间的交流。文件要求“各级领导人支持采取措施，以允许世界各地更多的学生在其他国家接受部分教育，并为来自国外的新生敞开自己的学术大门。”尽管各国在文件发布后开始呼吁难民的需求应被重视，但给人们的印象却是：支持促进去往这九个国家的入境流动仍然是疫情以后最重要的行动趋势。

这就显得特别奇怪，因为这 9 个国家所面临的招生挑战非常不同。在荷兰，学生人数整体显示急剧增加，尤其是国际学生现在占学生总数的 23%，这导致荷兰的大学敦促政府提供法律选择权以遏制国际学生的人数。另一方面，美国本科生人数大幅下降；因此，美国的大学，尤其是本科生人数下降

幅度最大的大学，被鼓励更加积极地招收国际学生，并可雇佣中介机构来帮助招生。

欧洲和加拿大组织分别发表了报告，提出了一种更全面、更具包容性的方法，遗憾的是，该方法并未充分反映在共同声明中，也未在美国报告中得到充分反映。美国的文件所提出的国家政策重点相当明显，声明如下：“我们认识到美国政府在国际教育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是基于它对美国人民所负有的责任，其对外交事务、国家安全以及经济和边境政策的职权，其提供国家和全球领导力的能力，以及它在影响全球对美国的看法方面的作用。”

共同声明还明确要促进线下流动和交流，但这仅仅只是全球学生群体中极少数人的选择。这类流动不涉及虚拟流动和交流、在线国际学习或虚拟工作安置。尽管在此之前许多机构已经开始为这些举措制定创造性的方法，但新冠疫情后，所有这些线下流动的替代方案都获得了额外的推动力。这些替代方案为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的国际参与形式提供支持，且已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与仅通过线下流动所能带来的成效相比，这些线上替代方案能使更多的学生参与其中。

错失的机会

各国报告反复提及数字国际化的重要性，但这在共同声明中却出人意料地未被提及。共同声明也未提及本土课程国际化的重要作用、国际化的社会影响（社会国际化）以及全体学生的全球学习问题。共同声明给人的总体印象是提倡一种西方化的、以线下流动为中心的国际教育方法，这种方法在过去可能是有价值的，但在现在和未来而言，价值却在递减。

必须说，报告错失了一个良好的机会来

提倡这些事宜，也没有将一些组织所倡导的内容反应出来。“全球南方国家”（Global South，即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伙伴可能需要继续探索如何才能在国际辩论中提升这些国家的声音。